

687174

0318

中国文学作品年编

56382

1981



短篇小说选

687174

0318

56382

0318
56382j1

中国文学作品年编（1981）

短篇小说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当代文学研究室编

中国文学作品年编

(1981)

短篇小说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75印张 2插页 424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132 定价: 1.65元

前 言

蒋守谦

粉碎“四人帮”之后，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学，如长江大河，一直在滔滔滚滚地向前发展着。别林斯基在论及这种“历史地发展着的文学”时指出：“在这儿，每一年都会带来些什么——这些东西便是进步。不过，这种进步不是每年都可以清楚地识别和确断的；它往往到了后来才显露出来。可是，无论如何，在特定的时间，例如在每年年终，来全面地检讨一下文学的进程、它的收获、它的丰饶或它的贫乏，总是十分有益的事。这样的概观对于目前固然不是没有用处，对于将来的文学史家也可以提供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素以敏锐、便捷见称的短篇小说，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作出灵敏反映，在艺术上进行大胆地、多方面地探索的一种“轻武器”。几年来，我国作家们也正是这样运用这个“轻武器”的。因此，注意研究短篇小说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助于感受我们这个新旧交替时期时代脉搏的跳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动向，促进创作的繁荣。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这项工作，于现在和将来，“总是十分有益的事”。

考察一个时期文学的状况，着眼点应该放在那些新的开拓、新的进步上面，追索促成这种新开拓、新进步的原因。新的开拓和进步，只能在作家们进行思想和艺术探索的过程中来实现。就那些属于探索性的作品而言，有的是达到了思想和艺术较为完美的统一，有的则未必尽如人意，甚至在读者中引起争论。这不是坏事。这里面常常包含着人们把创作推向前进的共同愿望。就是说，考察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那些受到社会公认的优秀作品上，眼界还应当放得更宽广些。我们编这个选本的目的，也就是想要体现上述意图。

—

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创作上的进步，我认为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方面。

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说，这并不是这一年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课题。因为新人形象塑造问题，在新中国文学中历来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短篇小说作家也是创造了一些闪耀着新的生活光彩、具有着较高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如乔光朴、刘毛妹、丁猛、郑志桐等等。不过，这个问题在一九八一年引起了更多作家的兴趣和重视。如果从短篇小说反映时代生活的敏锐性以及它所达到的广度、深度来看，这一年作品中出现的众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同前几年相比，就显得既有内在联系的一面，又有变化发展的一面了。

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总的说

来，大多数也还都具备着那种敢于突破左倾思潮藩篱，立志改革，决心开创新局面的思想特色。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它同以往新人形象保持着“内在联系”的地方。但是生活在前进，当人们在四化征途上继续迈进的时候，一些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社会主义新人总是在克服这些新矛盾过程中显出他们崇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的。作家们往往也都是敏锐地抓住生活中这些新矛盾及其被正确解决来进行新人形象塑造的。

我们在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首先看到了这种情况。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通过容儿和“怪人”这样两个农村先进青年的形象描绘，提出了一个当前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以后，是不是跟着也出现了只顾个人发家致富、不顾集体利益的社会风气了呢？新形势下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团支书、科研组长容儿的“心里事”，她的“委曲”情绪，正是由此而来的。直到从“怪人”那里得到启示，他们都共同认为团的工作仍应做好，科研小组需要积极开展活动，那朦胧的爱情在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上萌动起来，她才“吐了口长长的气，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舒坦”。一对既不同于“十七年”文艺中那种“大公无私”、又有别于近年来某些苦恼于左倾祸害的农村新人形象，悠然站在读者面前。作者的笔触是那样的细腻入微、真切新鲜，从揭示现实生活的新矛盾中发现了思虑和正确对待新矛盾的新人，读来不禁叫人耳目一新，兴味盎然。象这样在新时期农村由于贯彻三中全会路线而日益繁荣兴旺的背景上，从不同角度，刻画种种坚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关系，精明能

干，热爱集体、关心他人的农村新人形象的创作动向，在王吉呈的《女御史》、郑九蝉的《能媳妇》、张秋华的《东湖注之晨》、丁正泉的《小炉匠招婿》等篇什中，都有表现。这个创作上的新动向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欣喜。现在，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是：这些农村新人坚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关系的思想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人的品质，往往容易流于一种偶然性地要做一点好事的冲动，缺乏深刻的历史内容。我们见到的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都是这样的。在这方面，我觉得高晓声在其新作《崔全成》（《上海文学》1981年第10期）里作了值得我们重视的探讨。就这篇小说故事本身而言，作者只写了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的青年农民崔全成进城卖菜，用所得的钱为“倒霉”的队长崔大牛买一头“苗猪”，以帮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这么一个行动，情节很简单。但是由于作者对生活进行了深入地开掘，他就以独具的慧眼，窥到了这个农村新人这一行动可信的思想基础。崔全成“年富力强，精明能干，不光会劳动，善于经营，而且有相当强的分析能力。”他可以把诋毁生产责任制的“理论家”驳得哑口无言。他最早拥护生产责任制。实行这个制度，真使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然而他那“很强的分析能力”又时时提醒他，并不是所有社员都象他这样精明能干的，大多数人能不能在新形势下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普遍地提高他们的经济收益和社会财富，“这可是生产责任制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哪！”显然，他帮助崔大牛，不是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也不是简单地响应上级号召，履行某种义务，而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觉悟到他的命运是和大家的命运联在一起的。”崔全成形象所昭示于我们的是：

一个真正拥护生产责任制的有觉悟的农民，他本人的生产积极性在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同时，必然也会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关系。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小私有者道德，不属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高晓声是近几年来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的一位作家。有些研究者指出，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从大家所熟悉的李顺大开始，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写的《水东流》里的刘兴大、《陈奂生转业》里的陈奂生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带着一种令人心酸的“阿Q气”。这正是我国农民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踟蹰了二三十年所形成的一种悲剧心理的反映。但是中国农民毕竟并非人人都具有这种心理。所以，高晓声在《水东流》里尝试着写了同自己父亲那种小生产眼光和封建家长制观念相抗衡的农村姑娘淑英；在《水底障碍》（《雨花》1981年第7期）里写了敢于同那种“面孔比屁股还大”的地头蛇作斗争的老渔民张雨大。这些都是不带丝毫“阿Q气”的新人。但要讲开掘得深，真正揭示出新人思想基础和性格依据的，我觉得还是《崔全成》，虽然这篇小说在艺术上还没有达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那样的火候，主观议论多了一点。

还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马烽的《典型事例》和王润滋的《内当家》。两篇作品都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在今天的农村里那些真正按党的政策办事的干部和群众的可贵品质。《典型事例》里的大队支书蒋双喜，在公社书记陶清带着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贯彻党的农村政策之机大轰大嗡，搞那种杀鸡取卵式的所谓“致富道路”时，鉴于前横沟煤窑煤源濒临枯竭的前景，断然压缩曾经给

社员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煤窑生产，另办砖窑、石灰窑，从而显示了一个真正拥护党的政策的干部所具有的那种实事求是，讲究科学，善于谋划，能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远见卓识。这才是一个党的干部的党性和真正的政策水平的表现。从蒋双喜和陶清在对待党的政策不同态度上，我们看到了要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真的富起来，是多么需要蒋双喜这样的干部啊！和蒋双喜形象同样动人的是《内当家》里的普通社员李秋兰形象。作者把她放在接待刘金贵这样三十年前曾同她处于尖锐阶级对立之中、如今又以爱国华侨身份回乡观光的特定背景下来展示她的新品质。李秋兰一家现住的“果实房”，是刘金贵当年的“老住屋”。此时此地的新人李秋兰，既要坚决执行党的华侨政策，表现出迎宾待客的“礼”，又要顶住那个“气象大学毕业”的孙主任所谓注意“国际影响”，实际上是无视她作为“果实房”主人的权利，表现出翻身作主的“理”。把“礼”和“理”统一起来的，正是李秋兰“打从土改到如今”始终跟党“一条心”地干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精神。这种主人翁精神，不是作为一种理念活动，一种外加在人物身上的标签，而是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一种气质，一种个性特色，体现在她一招一式、一颦一笑之中的。蒋双喜、李秋兰和容儿、“怪人”、崔全成等一样，是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中出现的以往从未露过面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形象。

新社会的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思想、坚决按党政策办事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政策水平，在作家们揭示生活中的新矛盾、歌颂新人物的新品质、新个性时重新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农村题材的作品是这样，工业和其他题材的作品也是

这样。从甲杰英的《年关》和李君旭的《“外行”书记》中我们看到，存在于当前工业战线上一些矛盾，的确是带有普遍性而又十分棘手的。在《年关》里，老站长宋东山要改变自来水工人为了多拿加班费，人为地于每年年关之际搞管道“维修”的惯例，立刻遭到了依靠这种以多弄点钱解决工人群众实际困难为手段来带班的维修班长王大顺的强烈反对，王因觉得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甩手不干了。在《“外行”书记》里，厂领导为了改变即将到来的全面停产的危险局面，决定与外商签订一项订货合同。此时，党委书记苏泽立刻收到了一个车间的车间主任和副主任的联名辞呈，理由是这将暂时打破这个车间的生产秩序，使他们上任时许下的保证职工每月奖金稳定在全厂前三名的诺言归于“放汤”，失掉信誉，无法工作。面对着这样一种艰难而复杂的现状，尽管这两位领导干部的性格不同，宋东山拙朴笃实，苏泽豁达潇洒，但是他们都坚信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只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矛盾是可以得到正确地解决的。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两篇作品都提出了党的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党性的问题。特别是宋东山，当他下决心改变那种不合理的现状时，对王大顺说：“我只告诉你，今年停一分钟水，就丢共产党一分钟的脸，白给一分钱的加班费，就丢我们一分党性！那样的事说什么也不能再干了！”真可谓大气凛然，锐不可当。由于作家从生活里实际存在的尖锐矛盾中写人物，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宋东山，就不只是那种兢兢业业，于春节前带领工人把管道先检修一番的好人，而是一个坚韧不拔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斗士；我们看到的苏泽，也不只是那种虚怀若谷、足智多谋的行家，而是一个真正理解了

自己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开创新局面的优秀共产党员。

是的，我们不能把新人的内涵简单地归结为“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思想”、“党性原则”、“政策水平”等等。以上所提到的新人形象，我们也只是就其思想品质的基本特色来作这样分析的，就各个人物具体性格和精神风貌而言，那是要比这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的。而且，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传统概念，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也在跟着变化。特别是那些描写从当代青年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情况更是如此。比如航鹰的《金鹿儿》，作者就不仅写了女售货员金鹿儿热爱本职工作，周到、出色地为顾客服务的一面，而且写了她兴趣广泛、注重修饰、“把荣誉看得很淡”等等似乎是属于“异端”的一面，前者又是通过后者表现出来的。再如简嘉的《女炊事班长》，作者给我们塑造的薛钢，是一个在炊事班工作得极为出色，但却又声明自己还没有打算“决心在厨房干一辈子”，“受的表扬最多，挨的批评也最多”，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却又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组织上要入党的青年女兵。象这样一些生气勃勃的青年人，那是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新人的传统概念来范围的。不过，我们赞许金鹿儿和薛钢这样的新个性，觉得她们可信、可亲、可敬，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她们的性格和言行中贯穿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奋发工作这样一条鲜明红线的缘故。作家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些人物性格中那些看上去似属“异端”的东西，不仅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品格规范所容许存在的，而且，有许多东西，恰恰是时代所赋予社会主义新人品质的新内容。它把“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思想”、

“党性原则”和“政策水平”等等更加发展了，丰富了，“现代化”了。

《内当家》的作者王润滋说：“《内当家》是我试图运用阶级观点描写新的社会、新的人物的一次探索。”（《写民族之魂》，《小说选刊》1981年第8期）这句话道出了这篇小说成功的奥秘。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说，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中一些成功的新人形象，是作家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地分析新时期生活的矛盾，对生活中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的积极的先进的力量进行正确的艺术概括的结果。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关于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教导，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恪守不移的箴言。否则，在纷繁万状的现实生活面前，就无法鉴别新旧，以至犯以旧充新、以假乱真的错误。在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有些作者在歌颂青年中那种“不愿意庸庸碌碌的打发掉一生”的“奋斗者”时，就把平凡岗位上的劳动和“庸庸碌碌”混为一谈；有的作者歌颂所谓“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道德”，实际上却把道德抽象化，用“爱”的呓语来抹杀是非美丑的界限，宣扬托尔斯泰式的“道德的自我修养”；女大学生中生擒暴徒的“活雷锋”，竟是卑睨一切、“说不上自己要去哪儿”、连穿衣服都“仿佛为了对抗什么”的“星期六夜海人流中的女皇”。如此等等，貌似新人，实为沉渣泛起。这类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应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

二

人的地位、价值、权利、尊严问题，曾经长期是我国文学艺术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无人敢于涉猎的敏感地带。近几年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表现这个问题，愈来愈为作家艺术家们所关注。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从这个角度开掘生活、提炼主题、刻画人物的作品，比起往年，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质量也提高了。

列宁在痛斥俄国资产阶级的左派立宪民主党报纸《同志报》的谬论时说过：“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列宁全集》第13卷第36页）这就是说，作为一个阶级的人，他的价值和尊严，不仅同社会所给予他的地位、权利有关，而且同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所获得的权利，并为争取合理的社会地位、合理的权利而斗争有关。在阶级社会里，一个人，只有在他所属的阶级、民族、国家的地位得到改善，尊严得到确认，权利得到尊重，他个人的地位、尊严、权利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按理；在我们这样一个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的地位、价值、尊严、权利，从根本上说是应该得到正确对待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主义的流毒没有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仍在作祟，特别是十年浩

动期间，林彪、“四人帮”那条熔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于一炉而又以“最最革命”面貌出现的极左路线肆虐成灾，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人民群众中的许许多多无辜者被以种种荒唐的借口赶出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人的价值被抹杀，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权利被剥夺。这就是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受到越来越严重挫伤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九八一年的许多优秀短篇小说，正是从积极恢复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重新肯定他们的价值、尊严、权利这样的高度来反映生活、评说是非的。

以下一些情况，很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其一，在对人的地位、价值、尊严、权利的探讨中，作家们提出应当清扫那种渗透到革命队伍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以及制约着这种关系的伦理道德中的封建余毒。在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张弦的作品。前两年，张弦曾写出了《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一年，他又写出《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文汇》月刊1981年第1期）和《污点》（《江南》1981年第2期）等，在先前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开拓。《未亡人》里的周良蕙的爱情苦恼，看上去是个寡妇再嫁问题。在今天的生活中，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尖锐。但是象周良蕙这样一个原市委书记的遗孀，一个被落实了政策、当上了妇联副主任的局处级干部，她要再嫁的人，又是一个社会地位不高、出身不好、比她小五岁的邮递员。这样一门婚事在社会舆论上能否获得通过，严峻地考验着我们是否彻底地做到了尊重周良蕙“独立的人格、女性的尊严和爱情的权利”，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寡妇再嫁问题。周良蕙所遭到的来自市委书记、妇联主

任，一直到她的儿子的所谓要考虑“政治影响”之类种种不堪忍受的压力，有力地说明了所谓“政治影响”云云，不过是一种抹杀妇女独立人格的“夫贵妻荣”、“门当户对”之类封建观念的变种罢了。同样的，在《挣不断的红丝线》里，组织股长马秀花在给副师长老齐做媒时向傅玉洁所进行的番说教，诸如“一个人爱啥，恨啥，都是他的立场、观点决定的”，老齐“把青春都献给革命啦，你还能嫌人家老吗？”“你要很好地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啦！”听起来颇为“革命”。但她给同样献身于革命的傅玉洁所造成的压力和苦恼，使人想到这也不过是把封建社会中妇女本人无法保持独立人格和爱情权利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换成“革命需要、股长做媒”罢了。由于民主革命时期革命队伍中的民主空气占着上风，齐副师长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好同志，傅玉洁没有被这条“红丝线”拴住。但革命胜利后，傅走过了一段坎坷的道路，竟然又屈服于乖蹇命运，无可奈何地回到了齐副师长身边。不如此，她就无法安身。马秀花手中的这条用封建思想拧成的“红丝线”，在革命胜利前没有拴住傅玉洁，在革命胜利后的今天，却把她拴住了。这不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吗？张弦敢于去触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天公地道，实际上却是大谬不然的政治的、道德的观念，并且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上来加以深入地剖析，把批判封建思想和批判极左思潮有机地结合起来，唤起人们对人的地位、价值、尊严和权利的尊重，净化人与人之间被封建余毒污染了的关系，这就是他文笔显得那样犀利、深沉而又富有历史深度的原因。不过，读张弦的作品，我们常常有一种过分沉重、压抑的感觉，有些

读者对此不满，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不是因为作者在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时，对同时存在于生活中的光明的、积极的一面照顾不够，还没有把那些悲剧人物放到充分典型的环境里来描写有关呢？我以为可以这样考虑。

其二，从一些表现人的地位、价值、尊严、权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们为了探讨医治极左思潮在人们心灵上所造成的创伤而进行的新努力。王蒙在《深的湖》（《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里通过大学生们参观美展时的“意识流动”，展示了中国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社会变迁的足迹。画家杨开府之所以会经历从才华横溢、到“迷茫”“庸俗”、再到青春焕发这样一条曲折的生活道路，就是因为近三十年来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过尊重艺术家的地位——践踏艺术家的地位——又尊重艺术家的地位这样一个“之”字形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深刻地影响着杨开府的命运、权利、尊严和艺术才能的发挥。作品昭示青年一代，应从父辈曲折而又艰辛的经历中得到启迪，珍惜今天这个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开始受到重视的新现实，努力寻找最能发挥自己才智的合理的社会位置，提高自我价值。陈建功在《飘逝的花头巾》里提出的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问题。不过，他描写的重点在今天。大学生秦江和沈萍由于对自我价值理解不相同，一度沉沦过的秦江变得更加奋发，一度奋发过的沈萍却陷于沉沦。茹志鹃从婚姻、家庭的角度切入了这一领域。一九八一年，她运用同一素材接连写了两篇主题相近而同一主人公命运结局又有别的小说：《着暖色的雪地》和《丢了舵的小船》（《上海文学》1981年第8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董毓德在“文革”中丈夫被迫害致死，接踵而来的生活和

政治上的重压，使她不堪忍受。为了改变儿子的“反革命小崽子”身分，尽一个做母亲的义务，她违心地同工人陆阿才结婚。由于文化素养和性格情趣上的悬殊，董、陆婚后生活格格不入。之后，董无意中结识了同自己命运相似、情趣融洽的错划“右派”章珉。粉碎“四人帮”以后，董产生了与陆离异、与章结合的愿望。但是由于遭到包括她儿子在内的社会舆论的反对，这个愿望未及实现就抱憾病故了。这就是《着暖色的雪地》的艺术构思。它所要阐明的主题显然是这样的：董毓德之所以抱憾终天，带着巨大的伤痕死去，就是因为她的无可争议的人生权利没有得到尊重。或许，作者觉得这样的素材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作更深地开挖，也可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着在董、章那命运“雪地”乃至整个生活画面上的“暖色”还不够浓郁，在《丢了舵的小船》里，她除增加了章珉与秀珍那误会式的恋爱悲剧这条线索之外，从构思上又变董毓德抱憾而歿为董、章两人都在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产生了“重新安排生活”的强烈愿望和信心。董、章的生活将怎样“重新安排”呢？茹志鹃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她没有把“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恩格斯语）。作品的意境也因此变得更加开阔、深邃了。可能，董毓德终于同陆阿才离婚，章珉和秀珍解除婚约，董、章称心如意地结合在一起。然而照我看来，这也并非唯一、甚至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陆阿才和秀珍也都是善良的劳动者，如果他们遭到并非由于自己过错而带来的被抛弃的厄运，那同样也是不公平的。夫妻之间的精神生活，除了文化素养和情趣爱好这类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基础。陆阿才在董毓德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给了她“一